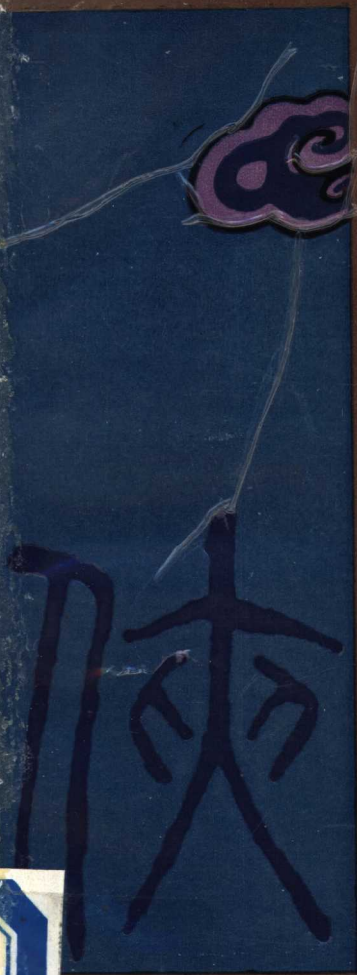


中国游侠史

汪涌豪

上海文化出版社



汪涌豪

中國游俠史

上海文化出版社

序

王运熙

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对政治、社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影响所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不少以侠客为题材的作品，唐传奇中的一些篇章，清代的一些侠义小说，是其显著的例子。因此，对古代游侠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考察，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能增进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

战国、西汉时期，游侠盛行。战国时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四大贵公子，仗义疏财，具有豪侠之风。他们手下各有许多门徒食客，其中有不少游侠之士。西汉游侠继续兴盛，《史记》、《汉书》均设《游侠列传》记载其事迹。此后，由于帝王的禁止、镇压，游侠稍衰，《史记》、《汉书》以后的各朝正史中，也不再设立游侠传。但事实上，西汉后的各个朝代，游侠仍然继续不断地涌现，只是发展呈波浪形，有时兴盛勃发，有时低落岑寂。一般说来，当中央专制政府统治力量强大时，游侠往往受到压抑；反之，当中央统治比较薄弱，特别是群雄纷争、社会动荡之际，游侠就容易得到广阔的活动天地，蔚然成风。由于《史记》、《汉书》以后各朝正史中再无游侠专传，

有关这一人群的情况，仅散见于史乘、笔记，缺乏系统的记载，因而人们对西汉以后他们的活动情况，往往知之甚少；倒是对文学作品中的一些侠义题材，比较熟悉。“五四”以来，也有少数学者，从社会史角度注意到游侠，但尚缺乏少详细论述之作。汪君此书，可说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游侠史专著，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本书的特点和优点，我觉得主要有二。其一是论述相当系统全面。全书共分八章，第一、二两章为上半部，在分析了游侠的性质特征之后，着重从纵向方向，系统叙述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晚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游侠情状，发掘、提供了许多文献资料。第三章以下为下半部，着重从横向方面，分别论析了游侠的社会关系、活动方式、人格特征、衰落原因等等，并把游侠和外国的骑士、武士作了比较分析。前后八章，纵向和横向的叙述、分析相结合，用读者对游侠的历史发展、特征、历史背景等获得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认识。其二是分析相当细致深入。作者不但勤于发掘、搜集有关原始资料，用全书材料详赡，而且善于吸取前人包括近现代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囊括群言，通过冷静的思考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章中对游侠和刺客的异同，和儒墨两家理想的异同，第六章中对游侠衰落原因的分析，都相当细致，并连有说服力。第三、四、五章，分析游侠的各种社会关系、活动方式、人格特征，尤使人有条分缕析，眉目分明之感。我不敢说这本游侠史已经写得十分完美，无可指摘，但作为一部草创性的专著，能够做到这样，应当说是颇为难能可贵的了。

汪君年轻好学，前数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生，已获博士学位。他潜心于中国古代文论

研究,著有《风骨论》一书,即将问世。还爱读历史,重视搜集、考查原始资料。为了写这本书,翻阅了《二十四史》中的许多有关篇章和大量其他文献资料。他又重视学习理论,注意吸收借鉴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写作论文,能注意以史实为依据,以理论为工具,从大量史料中概括出观点来。这样做,是比较严肃和科学的。在这本专著出版之后,希望他继续前进,继续提高,在中国文史研究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录

序.....王运熙

绪言..... 1

历史上的三游与士的失职——文士与武士的转换
——好文者为游士与尚武者为游侠——对游侠殆历
五百年的质疑

第一章 游侠：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11

释名与异称——类型区划——集团构成——与刺客
的契合与分际——与儒墨理想的同异——所谓任侠

第二章 游侠的发展历史.....45

在风雨瀕洞中崛起：先秦游侠的勃兴——置身于社
会生活的漩涡：两汉游侠的奋盛——衰世放狂：魏晋
南北朝游侠的发展——治乱相替与任侠成风：隋唐
五代游侠的风行——专制统治下的岑寂：宋元明清
游侠的消歇——历史大变局中的回响：晚清游侠的
流风余韵

第三章 游侠的社会关系..... 145

与公侯权贵相馈赠——在豪宗强右的庇荫下——强
藩的召募与重用——义结盗匪与躬自为盗——融入

农民起义的潮流——会党斗争的中坚	
第四章 游侠的活动方式	185
意在炫夸的服饰佩戴——悖去常道的资财获取——	
走马纵犬与少年之戏——不尽合法的任侠义举	
第五章 游侠的人格特征	218
慕义感分临难不苟的忠勇——重气轻死不爱其躯的	
疏放——修行砥名有以树立的自励——任张声势擅	
作威福的骄蛮	
第六章 游侠衰落根由的究诘	247
恒定社会设计与游侠的社会存在——传统道德规范	
与游侠的价值取向	
第七章 骑士·武士·游侠	268
骑士风度与游侠气派(比较之一)——武士精神与游	
侠崇尚(比较之二)	
第八章 游侠的存在意义及评价	288
乱世重游侠: 纷乱时事中的公道和良心——纵死侠	
骨香: 足以振拔人心的崇高精神	
后记	310
主要参考书目	313

绪 言

公元二世纪，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荀悦，本着“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的救世热忱，写了一部叫作《汉纪》的书。在书中，他对周秦以来的贪秽之俗作了强烈的抨击。而被他指为末世贪秽的习俗当中，就有我们关注的对象，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无数壮烈之举的游侠。他是这么说的：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繇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

显然，在他看来，游侠、游说和游行三者，都是大违道德礼义，不拘成法，乃或对先王先圣确立的礼治社会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他们不遵礼义纲纪和等级制度，去应奉之职守，当务之正业，而追求自己的声名，偏逞个人的私臆，实在是妨碍王化的罪魁祸首。并且，文中将游侠列在“三游”之首，似可看出他对这一种人的不满，是异常强烈的。

为了便于了解游侠活动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妨先从游说、游行的崛起说起。游说，顾名思义，是指靠说辞耸动主，以求进用之人，所谓“谈说之士资在于口”^①。这类人物，正如作者在同一段文中所说，“本生于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春秋之时，各诸侯国交往频繁，国与国之间有如攻战、会盟之事，都会派使臣前往联络。如何运用个人智慧完成君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弱国之使出往强国，如何维护国家利益，不丧权辱国，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考验。在这方面，《左传》一书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使我们据此得以想见昔日使臣的风采。再看游行，作者也说得明白，它“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乐行其道，以立功业于世”。也就是说，他是仁义贤达之士以道义相交，由以文会友达到以友辅仁的目的，而决非结党营私，用逞私欲者可比。

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到了周秦之末，情况改变了。春秋末、战国初，随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的迅速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确立，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调整策略，开始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而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以至战国时期，有布衣为相的情况出现，一般的敢任善任，不次提拔，就更为常见。与此相伴随，原为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阶层开始活跃起来。本来，这种被称作“士”的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接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

① 《商君书·算地》。

“大抵皆有职之人”^①，待春秋末期，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士再无田可食，也无原职守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知识和还可以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或勇力，他们或讲学授徒，或襄赞典礼。当然，也有人投身政治，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当各国君主急揽人才辅政之际，他们是乐于为君用的。他们连同在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并进而成为各国君主重要的依靠力量。与此密切相关，为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一些人或从师问学，以伺进机；或交友结党，用为援手，想方设法养大自己的名声，求取人主的垂顾，所以在游说者日众的同时，游行者也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那么，何以在游说、游行者并出的同时，其作为单个人的品节会被荀悦认为越来越低下、糟糕呢？这与东周以降，奴隶制终结、礼乐崩坏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政治形势酿成的社会氛围中，上至人君、下至一般士人，人人怀自利之心，风俗人心不免日趋浇薄和衰败。清人顾炎武就春秋与战国时期风俗的不同，做过一番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春秋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周矣；春秋时，犹重祭祀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此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化于此百三十三年之间。”^② 这“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可以说是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② 同上书，卷一三。

前面诸项礼义缺失导致的结果。所谓“士无定主”，是说当日士人的宗国观念淡薄，惯于附势趋利，哪里有利自己的发展，就哪里凑。由于他们撇开了先前礼义规范的束缚，一切言行皆根本于一己之私利，所以做出了种种为当时或后世正统士人不齿的事来。荀悦在文中称游说“失之甚者，至于为诈给徒众”，游行“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即据此而言。

游侠的产生，有着与上述两类人共同的历史背景。如果说，游说、游行是值社会大变动时代，旧贵族势力崩溃，中央与郡县行政机构尚未健全，社会等级及利益的重新划定尚未完成时，纷起并作，急欲凭才智谋取地位的话，那么，游侠同样是趁当日百度待兴之机，特别是国家政治运作、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之时，乘隙而奋盛于一时的。故荀悦说：“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飧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将游侠与前两者一律看作是末世风俗衰败的结果。尽管荀悦是站在正统的立场，谴责三游，但在一个无序的社会里，有一群漠视成规，以自己的原则行事的游侠产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以后，苏轼由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士的失职，分析何以到战国时游侠崛起，任侠之风弥散的原因，说得更为剀切：

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
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
贵，与此四者共之，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六国之
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
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
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
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
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
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
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
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
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
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①

推原苏轼的意思，他认为智勇辨力之士的失职，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游侠游士崛起的原因。联系前述春秋奴隶制时代，封建全盛，井田未坏，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百姓安于耕凿，很少有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井田制崩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之事接连发生，已无力顾及养士，有的则骄奢淫侈，根本无意恤士，最终致使士人“降在皂隶”、“于今为庶”，成为流离失职之人，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纷纷觊为士者的实际情况，及以后王夫之所谓“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逐横于天下”^②，他

① 《游士失职之祸》，《东坡志林》卷五。

② 《读通鉴论》卷三。

的论述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在文中，他分士为智、勇、辨、力四类，智、辨即智能之士，善辩之士、属于偏尚用文一类；与之相对，勇力之士，则偏属用武的一类。结合荀悦所论三游看，毋庸置疑，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而游侠则出于后者，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的勇力之士。

因此，接着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以便使对游侠社会角色的定位，真正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势。应该说，古代所谓士，大都是武士。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他们平居之时为卿大夫家臣，统驭百姓，战时执干戈以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对此，今人顾颉刚从古代学校即军政训练之所的角度，作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古时设庠序学校以教，这庠、序、学、校四者，在当时皆是被人用来肄射习武的。“其所以习射于学宫，驰驱于郊野，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①以后，杨宽通过论证西周大学为服从“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训条，教学内容一“以礼乐和射御为主”；西周大学教师称“师”，乃或当时称教师为“夫子”，皆是对军事名称之沿用^②，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论说。那么，武士是何时转变为后世的文士的呢！顾氏以为是在春秋末期，并举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日渐倾向内心修养，不再以武事为急，甚至羞言戎兵以为说明。不过他同时指出，战国初期，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

① 《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贵善半月刊》1卷7期，1940年。

② 《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古史新探》第20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美籍学者余英时在基本同意这种说法的同时，指出顾氏前后行文至少有两处矛盾：文士与武士既属分途发展，则不能说武士蜕化为文士，此其一；其二，文中既称“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则不能同时又称“古代之士皆武士”^①。其实，这是顾氏行文逻辑稍嫌混乱所致。察其本意，是想就最早的源头，指出古代之士皆武士。而又提出“文武兼包之士”，表明他对古代之士的真实情况是了解的。至于文武之士分途发展，则是就其流变而言的，与武士蜕化为文士这一对源的解说并不相悖。

武士，或者说，古代受到过六艺教育并文武兼备之士，至战国时分化为文、武两途，是与当时大变动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说，当日各国统治者为了谋取霸主地位，争相揽士，而士人为改变自己失职的处境，以求有所发展，也乐于为人主所用。依他们所受的教育而言虽颇全面，“春、秋教以礼乐”，使他们知礼能武，“冬、夏教以诗书”，又使他们会断章取义，赋诗以言志。但依各人情况而言，总有长于文章辞令和长于射御攻战之别。前者发挥其所长，宣扬礼义教化而成儒，主张兼爱非攻而成墨，鼓吹现时功效以干时主而为纵横家；后者发挥其所长，则为奋死无顾忌的勇士，乃或替人打仗、任气尚义的侠士，是很自然的事，并非顾氏率意妄断，或为行文之便，偏举两端以为对待。故此，这一说法赞同者较多，而其中吕思勉所谓“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②，应该说最为允当。他不说好文者为儒，而泛言为游士，似更符合当时的社会

①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士与中国文化》第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秦汉史》第5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实际。

战国之士分而为两途，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还可以从时人对士的称谓中得到证明。战国时期所谓士，有多重含义，就类别而言，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法。如《墨子·杂守》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伎士”等几类，《商君书·算地》则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五类，他如《庄子·徐无鬼》更将之细析为十二类。不过，总括这一时期的文献，则大抵有文士、武士、低级官吏、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士等六类^①。文士又可分成如下几类，一是以道德节义著称的道德之士，包括所谓“通士”、“直士”、“志士”、“修士”；一是崇尚学识的才智之士，包括“文学之士”、“辩士”（又称“弘辩之士”、“辩说之士”、“辩知之士”）、“法士”（又称“能法之士”、“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法律之士”）、“游士”（又称“游说之士”、“言谈之士”、“谈说之士”）等。当然，还有“居士”、“处士”、“隐士”这类清静无为之人。前及游说、游行，多出于“辩士”和“游士”之中。武士除被称为“农战之士”、“列阵之士”、“持戟之士”的国家武装力量外，尚有力士和夹士两类。前者指力大而勇悍的壮士，在当时他们多充任权贵的护卫，也有被用为高官的，如秦武王时，“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②。后者专能见义勇为，不逃危难，且轻生重气，虽死无悔，因此，时人又称其为“烈士”、“勇士”，如聂政就被称作“勇敢士”^③。其他如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之

① 见刘泽华《战国时期士考述》，《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第1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战国策·韩策二》。

人，他们“不垦而食”，是所谓手工业者。商贾之士以经营货物买卖为生计，目的在逐利，尚不得归入文士或武士一类中。但低级官吏在当时多指司法官的属吏，如《孟子·告子下》有“管夷吾举于士”，赵岐注曰：士，狱官；或者指在基层治民的官员，如《管子·八观》中称“里尉”为士，《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士吏”一词；当然，也有用以泛指各种属吏的。方术士指卜巫、相面和堪舆之人，他们多是一些破落的读书人，在当日这些人颇为活跃，有的还得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可以归入偏尚用文一类的。据此，我们可以说，当日士阶层中人各以性分所近，各趋所欲，大体而言，确乎存在着不是用文就是尚武的情况，说游侠起于武士，也大致符合历史事实。

为了清晰、深入地说明游侠社会角色之所属，我们不惜花较大的篇幅，回溯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我们将游侠视作士阶层的一分子，是就春秋、战国游侠初起时的情形说的，而秦汉以后，游侠的来源变得十分复杂，成份淆乱不易究诘，是否都是士阶层中人已很难说，至于是否都由武士转换而来，更大可置疑。并且愈往后，就各个因素综合考察的结果看，真正属于士阶层的游侠愈来愈少，社会对他们的认识也愈来愈不同。如前及荀悦称“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为盗贼也”。虽以其源出正义，然大要在否定游侠。而此前司马迁对其却极尽彰扬之能事，称其“盖亦有足多焉”^①，“义者有取焉”^②。汉以后，历代人对其评价也是各主所是，多有不同。但自《史

① 《史记·游侠列传》。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记》、《汉书》之后，其活动已再不见载于封建正史。后世学者以及今天的研究者遂据此以为经两汉后，游侠已基本消亡。如顾颉刚就说：“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五百年。……范曄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① 孙铁钢也说：“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② 游侠的人格既是那么的复杂，它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难以一言评说；游侠的行为既是那么的爽朗、放达，以至流于乖张，然而它们却能直接诉诸人的情感，千载之下，几乎不待理智的消解和知性的过滤，便能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让人读他为之神旺，谈他手足舞蹈，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人玩味的事。只是，游侠的真实面目因封建统治者的裁抑翦灭，因封建正统史家的摒弃不录，抑或还因游侠自身生活理想、处世方式的限定，一直模糊不可辨识，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至为遗憾的事情。

① 《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卷7期，1940年。

② 《秦汉时代士和侠的式微》，《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5年第2期。